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赈灾行动述略

池子华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 不断拓宽人道主义服务领域。本文梳理有关资料, 对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赈灾行动进行考察, 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广泛参与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之灾的救助, 在中国救荒史上留下闪光的业绩。

关键词: 北京政府时期; 中国红十字会; 赈灾行动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1904 年诞生的中国红十字会, 固然以救死扶伤为天职, 但拯灾赈饥, 扶危济困, 也是红会分内之事, 正所谓“遇战事, 疗伤瘥, 固其天职, 而平时济荒赈饥, 亦其当尽之义务。”¹这一理念, 使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领域由单纯的战时救护扩展为赈灾救荒和社会服务, 尤其是赈灾救荒, 逐渐成为红会的“特色”服务领域。

红会拯灾赈饥, 开端于晚清时期, 1910 年夏, “皖北旱灾(误, 应为水灾——引者), 继以大疫, 死亡枕藉。本会急派医士学生, 携带救疫药物器具, 组织救疫医队, 为甲乙丙丁四队, 冒暑驰往皖北之临淮、寿州、凤阳、正阳、凤台、怀远、宿州、蚌埠, 及苏省之清江、海州、桃源等处, 竭力拯救, 治愈者六万七千五百余人。于时办理急赈者, 为本会组织之华洋义赈会, 集款至百七十万, 全活无算, 成绩昭然, 故本会得以全力专任救疫。”²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天灾人祸肆行, 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护兵燹的同时, 广泛参与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之灾的救助, 在中国救荒史上留下闪光的业绩。

一、水灾的救济

人祸天灾, 莫过于刀兵水火, “夫天下之大变有三: 攻城杀人, 喋血遍野, 莫如刀兵; 天昏扎瘴, 死亡俄顷, 莫如疫疠。至如河决海溢, 淫潦为灾, 则莫如水, 曠干炎燹, 赤地千里, 火山爆裂, 陵谷易位, 则又莫如火”。刀兵之外, 对水旱自然灾害的救助, 也是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的职责, 这是起存在的重要理由, 正所谓“消其沴, 澹其灾, 以冀补救于什一, 此红十字会所以踵行于中国也。”³先看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水灾的救济。

1912 年, 民国刚刚诞生, 便遭遇顺直和浙江温处特大水灾。这年夏, 顺直阴雨连绵, 山洪爆发, 酿成“数十年未有之奇灾”, 永定、大清、滹沱、子牙等河“相继泛决, 一望无涯, 可数百里。灾区有三十六州县之广, 灾民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非随流漂泊, 即露宿风栖。”⁴此次大水, 天津受灾尤为严重, “查此次四河陡涨, 为庚子后十余年所未有。该省西北、东北各州县均成泽国, 而以天津、武清、宝坻各县为尤甚。”⁵灾情发生后, 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代表杨宝恒、卞荫昌、刘家桢、刘孟扬 4 人利用参加“统一大会”之机, 与总会

¹ 沈敦和:《〈人道指南〉发刊词》,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04 页。

²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4 页。

³ 沈金涛:《〈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发刊词》, 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05 页。

⁴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806 页。

⁵ 《申报》1912 年 8 月 9 日。

总办事处“协商筹赈事宜。”⁶总办事处对顺直水灾十分重视。统一大会结束后，沈敦和立即在《申报》发布劝募顺直赈捐启事，接着，专程赴京“商顺直赈务”⁷，并“亲往顺直灾区，调查月余，岁除返沪，尚有未到之处，请代表朱静波、姚廷薰亲历调查。”⁸返沪后，除募集棉衣 60000 套、粮食数万石运往灾区散放急赈外，“分电各省团体、英荷各属华侨、万国红十字会等处告急募捐。而常议员、赞助团亦分头劝募，不遗余力。”⁹

北方顺直水祸未已，东南温处又告陆沉。夏秋之交，浙江温州、处州遭洪水狂飙席卷，酿成巨灾，淹毙人口达 30 余万，尤其处州府，“水灾异常奇重，实为数百年所未有。顷悉该处共有十县，青田、云和等五县漂没无存，共计淹毙人口至二十二万有奇。”¹⁰浙东温州遭飓风袭击，溺毙无算。两处“未经淹毙者数几百万，但家室荡然，饥寒交迫，无住无食，何以为生？”¹¹温处沉灾，引起中国红十字会的严重关切，11 月初，沈敦和副会长特举陆军第一军军医司长柏栋臣医生为队长，陈士芬医生为副队长，连同看护、配药 20 余人，组成救疫医队；掩埋队一队，专埋沙掩水冲及暴露之尸骸；放赈队随带棉衣 2000 套、白米数百担、洋银数千元，“医赈兼施”。鉴于青田受灾至重，“全邑被淹只余房屋四处”，沈副会长特商请唐锡晋善士组织赈务专家 10 余人，以“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的名义，带旧棉衣万余套，小包面粉 20000 袋，于 11 月 5 日乘“普济船”赴处州，专办青田赈务¹²。

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医赈兼施，救生葬亡，不遗余力”。据报道，红十字志愿者于温州瓯江、外洋、双溪、安溪、平偃、钱仓、石郭以及江南沙头、西湾、下湾、临福等村“施诊给米”后，于 12 月开赴小溪、密溪、乌云、白岩等地，随带棉衣、银钱、药材、粮食，“查明户口，核实散放”，沿途“饿殍腐尸，随地掩埋。”¹³温处赈务至次年春告毕，“灾民受赈者二万余人，疗治伤病数千人，掩埋尸棺数百具。”¹⁴

1914 年，日德之战本已使胶东半岛的民众惨遭池鱼之殃，雪上加霜，水灾接踵，更陷他们于水深火热的尴尬境地。据《东方杂志》报道，9 月以来，胶东“淫雨经旬，潍县、胶县、高密、即墨等四县，河流漫溢，冲塌民房，淹毙人口甚多，生命财产，损失颇巨。”¹⁵水灾发生后，鲁省当局向中国红十字会发出求助吁请，谓：“贵会系慈善性质，原不必限于军事，可否商请在会诸君就近遇有灾民一视同仁，量力赈济，尤为造福不浅。如蒙允可，敝处当电飭各县，遇事接洽，以资协助。”¹⁶内务部亦致电红会，望“贵会仁心毅力，慈善为怀，度必能一视同仁，救斯民于陷溺，拟请酌集赈款，转飭医队，衡量情形，就近协同赈济，庶难民不致流离失所，造福实为无量。”¹⁷9 月 17 日，中国红十字会莱州分会傅医长也向总会总办事处发出乞赈急电，云“莱州西、北两境被水极酷，竹筏冲散，村庄水淹者百余处，死亡何止数千人，水势浩涨，较之三年前淮灾尤高数尺。就近境而言，被水之区广五十里，袤二百里，秋收全毁，由此至平度，非舟不行，食物已尽，需赈极巨且急，即请速筹款项，以惠灾黎。”¹⁸

乞赈函电，纷至沓来。沈敦和副会长立即电请青岛兵灾救护队庶务长邓笠航改充调查

⁶ 《顺直乞赈函》，《申报》1912 年 11 月 11 日。

⁷ 《红十字队员救灾热》，《申报》1912 年 12 月 12 日。

⁸ 《报告灾区惨状》，《申报》1913 年 1 月 16 日。

⁹ 《红十字会之筹赈忙》，《申报》1913 年 1 月 12 日。

¹⁰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07 页。

¹¹ 《申报》1912 年 9 月 24 日。

¹² 《红十字会温处赈务记》，《申报》1912 年 11 月 5 日。

¹³ 《红十字队员救灾热》，《申报》1912 年 12 月 12 日。

¹⁴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7 页。

¹⁵ 《东方杂志》第 11 卷第 4 号，第 20 页。

¹⁶ 《胶澳战云中之水灾》，《申报》1914 年 9 月 17 日。

¹⁷ 《红十字会之鲁省救济》，《申报》1914 年 9 月 20 日。

¹⁸ 《红十字会之鲁省救济》，《申报》1914 年 9 月 20 日。

员，率同书记前赴灾区查赈，“并照摄灾民惨状，详细报告，以凭核定赈济办法。”¹⁹9月22日，总办事处在沪召开第九次常议会，鉴于“此次鲁省水灾有六、七县之广，生命财产损失甚巨，水势之大较之三年前皖灾尤烈，哀鸿嗷嗷待哺，本会迭经该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分会来电告灾乞赈”，决定“筹募捐款，酌量放赈。”²⁰沈敦和当场捐出200元，常议员蒋星阶、江趋丹等亦纷纷解囊。9月28日，总办事处在《申报》刊发《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山东水灾赈捐并新旧棉衣广告》，深望“海内外仁人君子，慨解仁囊，源源接济”，如有穿旧棉衣裤等，“弃置勿御，不憚手足之劳，检助本会，汇解灾区”²¹，以解燃眉。

浩浩哀鸿，荡析离居，嗷嗷待哺。沈敦和副会长心系灾民，常议会后即携款万元、棉衣5000件驰赴胶东，散放急赈。但灾区既广，灾民众多，所携之款，杯水车薪。沈敦和旋即赴京求助。由于沈副会长“不远数千里，奔走呼号于冰天雪地之中，且又自垫巨款以为之倡”，“至诚足以动人”，终使大总统命令财政部会议特别筹划，并得陇海铁路督办施省之、交通银行行长任振采“慨然允代筹募。”²²部拨及捐款陆续汇往山东。赈务持续到1915年春，据放赈员报告，被灾村庄244处，其间受灾最重者1547户，次重者8599户，较轻者3237户，“均已一律放讫。”²³此次放赈，计用款约32000余元，由于“事前先派救护队邓笠航携书记及摄影者实地调查，故灾区沾惠无虚。”²⁴

1915年是一个大灾之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风灾、火灾层见，其中以水灾为甚，水灾救济自然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重心。

7月初，浙江淫雨连绵，山洪陡发，猝患水灾，衢州地区所属开化、常山、龙游等县“四乡之淹没者至数千余家，田庐牲畜尽付汪洋，溺毙男女不可胜计，而被灾难民且多至十余万众”²⁵，“实为从前未有之奇灾。”²⁶灾情发生后，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及财政厅长先后向红会乞赈。救灾恤难，为红会天职所关。总办事处当即垫银洋5000千元，于23日派蔡天泰、盛钟英等驰赴灾区赶放急赈²⁷，同时在《申报》连续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浙江衢属水灾急赈》、《中国红十字会沥陈浙江灾况敬募急赈》广告，劝募捐款，源源接济，计前后用款24000余元²⁸。

浙江衢州水患乞赈方殷，东粤奇灾同时告警。7月以来，广东三江流域洪水为灾，“北江之连县、连山、阳山、翁源、清远、佛冈、英德、龙门等县皆被灾，而以连县、连山、阳山三县为尤重；东江之增城、河源、兴宁、博罗、惠阳、龙川、东莞亦皆被灾。近因连日风雨，西江水旁又涨，以致高要、三水、四会、德庆、新兴、南海各县，同被重灾。”²⁹广东分会急派医队救援，并于7月22日致电总会总办事处，“请赶募急赈，协力救济云。”³⁰23日，《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广东水灾赈捐》的广告便在《申报》上刊出，在此后的月余中，募捐广告刊出10余次，所募捐款，汇往广东，协济分会的救灾善举。在广东水灾的救助中，天津分会伸出援手，8月15、16、17日三日，通过电影、书画展等形式，筹集善款，“稍尽绵薄，聊赈灾区。”³¹

浙江、广东灾赈尚未办竣，江西乞赈之声又起。江西自7月初旬开始，大雨如注，洪

¹⁹ 《申报》1914年9月17日。

²⁰ 《红十字会常议会纪事》，《申报》1914年9月24日。

²¹ 《中国红十字会急募山东水灾赈捐并新旧棉衣广告》，《申报》1914年9月28日。

²² 《红十字会筹赈之进行》，《申报》1915年1月18日。

²³ 《红十字会放赈报告》，《申报》1915年2月17日。

²⁴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13页。

²⁵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浙江衢属水灾急赈》，《申报》1915年7月22日。

²⁶ 《东方杂志》第12卷第10号，第2页。

²⁷ 《红十字会垫款放赈》，《申报》1915年7月25日。

²⁸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²⁹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页。

³⁰ 《红会筹赈粤灾》，《申报》1915年7月23日。

³¹ 《天津红十字分会书画慈善会广告》，《大公报》1915年8月14日。

水横流，“冲毁城垣，平地水深丈余，淹毙人口无算。”³²大水很快退去，而灾害影响却一时无法消除，饥民载道，饿殍遍野，直到秋后，啼饥号寒之声不绝。11月初，江西巡按使戚杨电致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乞赈，电文称：“赣省近年水患频仍，今夏灾情尤巨，万安、泰和、吉安、临江等县灾民十余万之多，村社田庐漂没殆尽，哀鸿载道，惨不忍言，虽请帑筹捐藉资补救，惟将届冬令，民情困苦，饥则无食，寒则无衣，来日方长，嗷嗷待毙。环顾灾众，寝馈难安，因思贵会好善为怀，对于粤、浙等省，一经呼吁，无不立沛甘霖，毅力热心，钦仰无既，赣省事同一律，定荷哀矜，若蒙派员调查，协筹赈抚，则昏垫余生，悉受嘉惠。”³³中国红十字会“营救灾难，一视同仁，自应继续进行，拯兹痛苦。”³⁴接乞赈电后，总办事处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西万泰吉临等县水灾急赈》的同时，派苏筱斋等前往灾区调查灾情。隆冬时节，灾民露宿荒郊，饥寒交迫。12月21日，总办事处特解第一批棉衣1000件运赴南昌交省公署转发灾区散放，第二批棉衣也在赶制之中³⁵。同时“筹巨款汇到灾区，决定以工代赈，修筑堤圩，俾图永安之策。”³⁶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对浙江、广东、江西水灾的赈济，得助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从7月至次年春，《申报》所载红会“敬谢”、“谨谢”各界捐款、捐助棉衣等的征信广告连篇累牍，不难想见。没有社会各界的热心参与，红会的善行无由得施，这是不言而喻的。

1916年夏秋之交，安徽大雨滂沱，河湖并涨，山洪怒发，“江淮一带，上而豫之固始、光、息，皖之阜阳、颍上、霍邱、寿县、凤台、淮远以迄于临淮、五河、盱眙等县，汪洋千里，一望无际。而沿村庐舍、大地、禾黍悉浸入洪涛骇浪之中，累累浮尸，触目皆是，甚者森森树木，竟如沿岸芦柴飘摇水面，孑余穷黎，无家可归，无食可觅，类都穴山巢树，露宿风餐，号哭之声，昼夜不绝。一种惨酷情形，断非郑侠流民图所能曲绘。”³⁷告灾乞赈，函电交驰。总会总办事处一方面通过传媒向社会各界劝募急赈，一方面于9月17日与安徽旅沪同乡会合组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沈敦和、余诚格（字寿平）、李经方（字伯行）任干事部长，共筹皖赈。23日，召开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由义赈会垫洋20000元，分请灾区传教士会同义赈会查赈员择被灾尤重之户先为酌放，而后募集捐款，次第放赈³⁸。12月16日，查赈员回沪复命，据报告，此次沿淮淮北被灾各县以淮远、凤台、五河为最重，凤阳之淮彼岸、寿州之正阳关、颍上之东乡、霍邱之三河尖、灵璧之南四区、盱眙之水七堡、阜阳之南八保为次。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遂决议，购白米3000石、棉衣3000件，刻日运抵蚌埠转运淮远、凤台、五河三县，又购买高粱万石、黄豆3000石，散放被灾各县以为籽种³⁹。转瞬交春，“各灾区田皆被淹，颗粒无收，非特无度日之粮，抑且无耕田之种，非广购高粱、黄豆、绿豆、珠（芝）麻等种籽及时散放，则浩浩哀鸿，将永无出水火而等衽席之一日。”⁴⁰赶办春赈迫在眉睫。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于1917年2月在上海、镇江分购红粮1600余包、豆饼29000张装运蚌埠分转灵璧、盱眙、阜阳、涡阳、蒙城等5县散放⁴¹。皖北赈务直到1917年夏初始告结束，“灾民获沾实惠者，数逾十万。”⁴²

³² 《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第3页。

³³ 《赣省乞赈电文》，《申报》1915年11月11日。

³⁴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西万泰吉临等县水灾急赈》，《申报》1915年11月10日。

³⁵ 《赣巡按对于红十字会之感谢》，《申报》1915年12月23日。

³⁶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15页。

³⁷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江皖水灾急赈》，《申报》1916年8月17日。

³⁸ 《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通告成立并谨募急赈》、《筹办皖赈之垫款》，《申报》1916年9月23日、24日。

³⁹ 《安徽义赈会记事》，《申报》1916年12月17日。

⁴⁰ 《中国红十字会安徽义赈会之最近报告并敬募冬春赈》，《申报》1917年1月5日。

⁴¹ 《赈济皖北灾黎》，《申报》1917年2月28日。

⁴²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溃决，洪水泛滥，百余县受灾，灾民达560余万人⁴³。这是一场号称170年来未遇的奇重之灾。大灾发生后，乞赈函电，雪片飞来，先是直隶督军曹錕来电乞赈，并请政府将前此青岛兵灾救济批准未拨之20000元如数拨交红会，以便赶办急赈。接着京兆尹王达致电沈敦和副会长求助，谓“京兆于七月十五日后淫雨积旬，黄流盛涨，永定、北运及各县河流同时漫决，致近河十数县尽成泽国，淹毙人口无算，幸存者岩栖露宿，无衣无食，朝不谋夕，现虽请款赶放急赈，惟灾区过广，普及为难，诚恐迁延，道瑾相望。我公痼瘵在抱，夙所钦心。京兆为中央根本，必蒙休戚相关，代为呼吁，为此驰电，为民请命，务乞仁施立沛，救此孑遗”。继而旅津浙绅严昭明来函，以“直属被灾，极重各县为武清、宝坻、涿州、房山、文安、大成、获鹿等处，而石家庄向称繁盛之区，近以被灾，仅存五六户，其惨可知。至于津埠，现由南方友人代为调查并放急赈，每日约放千元以上，并散馒头、面饼。转眼秋凉，饥寒交迫，非有大宗款项，万难救济，务祈迅为劝募巨款接济云。”⁴⁴中国红十字会闻讯，立即在《申报》刊发《谨募直隶水灾急赈》广告。8月31日，沈敦和在总办事处召开职员会，议决“赶紧设法筹捐并多制痢疾、疟疾、疥疮药品携往散放。因此次直隶水灾蔓延至十数州县，地面既大，灾民又众，非有大宗赈款，断难普及，且水灾之后必患疥疮、疟疾、痢疾等症，故特备此药以救之。”⁴⁵9月15日，总会总办事处派蔡吉逢、朱仲宾、邓笠航、姚衢笙为放赈员，携粮款药品北上，分赴京兆、天津、石家庄、文安等“被灾尤重区域先行散放（急赈）。”⁴⁶

直隶巨灾，地面广，灾民众，“非集有大宗（款项）急赈断不足以普救惠而全蚁命。”⁴⁷然而，市面凋敝，金融竭蹶，筹集巨款，谈何容易。为此，总办事处费尽心机，在筹款方式上大胆创新，作了如下尝试。

首先，仍然是借助大众传媒劝募，但在广告内容上，在保留“雅”的传统广告特色的同时，增发“俗”广告，语句通俗，娓娓道来。《中国红十字会敬募京直二次水灾急赈》就是一例，广告说：“今秋京兆、直隶两省水灾，多至九十余处，实为从来未有的大劫，那料上一次的水尚未净退，而天津地面，第二次大水又来了。阿哟，这样的天灾叠至，叫北地灾民，如何能受呢？日昨本会放赈员来说道，天津各河的水，顿时涨起，三岔河、三条石、三宫庙、侯家后等处，水深没踝，都成泽国，居民不及逃避，葬入水中，那幸而活着的，大家躲在高阜，呼号待救，故而本会放赈员，冒险雇舟，在那高楼上、屋顶上，以及大树梢头，极力的抢救，保全灾民至六七百人之多，除去男壮，有可以投靠的自己散去外，那妇孺老弱之辈，皆送到女子工艺传习所暂为留养，一面购办干粮、药物芦席等件，见人散放，以济目前。无奈现在避难的灾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的，沿路不绝，其枵腹露体，嗷嗷待哺的情形，言之实在可惨。本会接电后，现正赶办杂粮饼干棉衣等，刻日续运至津散放。但是灾区既大，灾民极多，倘要一律赈济，断不是本会独立所能办到的，故而要求恳，普天下的，仁人君子，大家量力捐助，或省吃一桌酒席，或省做一件新衣，将那款子送至本会，充助急赈。多得一金，就可以多活一命，早施一日，就可以早救一人。况且北方地方寒冷得很，一到八九月间，就要穿着棉衣了，但望诸位大善士，大家捐助棉衣，不拘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可以合用的，但使北省灾民，大家保全性命，免得饥，免得冻，岂不是助捐诸公的公德吗？天道好远，报应不爽，积善余庆，可以预先算定的。诸公诸公，快，来捐助哟。倘蒙乐助，不论现款棉衣，均请送至二马路本会总办事处，立取收据，并登报征信，决不有误。”⁴⁸这种近乎“大白话”的语言风格，毫无疑问，更容易走近普通民众，激发起最大多数人的捐助热情。

⁴³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64、867页。

⁴⁴ 《乞赈函电雪片飞来》，《申报》1917年8月2日。

⁴⁵ 《红十字开职员会》，《申报》1917年9月1日。

⁴⁶ 《红十字会派员放赈》，《申报》1917年9月16日。

⁴⁷ 《沈仲礼朱葆三谨募京兆直隶水灾急赈》，《申报》1917年9月5日。

⁴⁸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京直二次水灾急赈》，《申报》1917年9月28日。

“雅”、“俗”并行，可收“广而告之”之效。

其次，广告语言固然可以激发人们的慈善之心，但缺乏直观性，利用灾区惨状图片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所以，总办事处在收到天津分会所摄多幅灾区惨状照片后，立即放大、翻印，张挂通衢。照片的传真性、直观性，给人以感官的强烈刺激，震撼人心，大大“引起一般善士乐助观念”，这就难怪照片刚挂出一个星期，“捐款颇多，法公董局捐送银二千五百两，连同零星之款，已集有一万八千余元。”⁴⁹

其三，举办灯会、游园等活动筹集赈款。9月8日至12日，中国红十字会假上海大世界“特开京直水灾救护灯会”（15日、16日续开两日），展出欧战中红十字会救护器械、飞艇、潜艇、武装汽车（装甲车）、救护汽车等新奇照片，还有南丁格尔肖像、盆景、名画、灾民图等等，“灯彩亦均极光怪陆离”，以这种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藉以披露灾情及世界红会种种救护真相（相片），以兴起沪人士好善观念。”⁵⁰门票收入，全部移作赈款。11月18日至22日，中国红十字会又假座苏州拙政园“特开京直水灾筹赈游览大会”，游览券每张洋5角，游览内容包括军乐队、说唱、焰火、灯彩、书法绘画、名菊展以及“天津各国租界水灾发时真象（照片）并本会救灾、留养妇孺活动影戏”。市民及游客“既极游观之乐，实拯饥溺之灾”⁵¹，自然具有吸引力。

其四，为方便市民捐款，总办事处在上海各大宝号“设立木箱，张贴灾民惨状以为募捐之助”，是为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募捐箱之始，意义重大。募捐箱“议定每一星期由本会派员会同各宝号监视开检一次以昭郑重而免流弊”。10月下旬第一次开箱，共收大洋107元，小洋330角，铜元1376枚，另有赤金琐片、储蓄彩票、俄币等⁵²。11月11日，上海公共体育场举办童子军联合运动会，红会亦添设募捐箱，“请观者解囊，随缘乐助，以救灾民。”⁵³

其五，寻求外援。10月29日，沈敦和副会长特委托路透社“拍发全球通电，报告京直灾情”，起到一定作用，11月3日，总办事处即收到英国代领事转交的曼谷《太晤士报》代募赈款银400余两⁵⁴。

募捐形式的别致和多样，新人耳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捐款捐物，络绎不绝。在京直水灾的救济行动中，中国红十字会能筹集到20余万元的巨款，与募捐形式的创新大有关系。

款物滚滚而来，保证了赈灾的顺利展开。

在天津，10月2日，总办事处将棉衣6000件并饼干、药物装“通州”轮运津，又制备棉衣7000件陆续发往天津散放。鉴于“津埠大水除施救得生者外，其余淹毙人口久置水中，居民再饮此水，必生大疫”，特电天津分会打捞尸骸，“运赴远地埋葬”⁵⁵，全部费用由总会担负。同时开办妇孺留养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孺400余人至次年春。天津所属杨柳青被灾尤重，查赈员姚衢笙采购3000元杂粮，“临灾地急济哀黎”，“查得极贫者六千七百余人，散放红粮、棉衣、饼干、药品等，筹备至周，措施极当，并于孤寡产妇四百余口特别赈济，尤为完善。”⁵⁶

在京兆，10月19日，总办事处制备棉衣7000件，由太古“奉天”号轮承运，散放京兆各县并天津四乡。不久，京兆尹王达与美国红十字会代表顾临商妥以工代赈办法：招集京

⁴⁹ 《红十字会纪事两则》，《申报》1917年10月9日。

⁵⁰ 《中国红十字会假座大世界特开京直水灾救护灯会露布》，《中国红十字会假座大世界续开京直水灾救护灯会两天游资日夜仍售两角》，《申报》1917年9月5日、15日。

⁵¹ 《中国红十字会假座苏州拙政园特开京直水灾筹赈游览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假座苏州拙政园特开京直水灾筹赈游览大会续延初七八两天》，《申报》1917年11月20日、21日。

⁵² 《中国红十字会开检第一次募捐箱志谢》，《申报》1917年10月23日。

⁵³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年11月12日。

⁵⁴ 《红十字会赈务二则》，《申报》1917年11月4日。

⁵⁵ 《红会拟收葬灾民尸骸电》，《申报》1917年10月4日。

⁵⁶ 《天津杨柳青全镇绅耆谨谢中国红十字会》，《申报》1917年12月21日。

属被灾 12 县难民 20000 人修筑由京至汤山公路，每人每月工资 5 元，另给棉衣一套，工资由美国红十字会支付，棉衣则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⁵⁷。总会总办事处立即行动，赶制棉衣，如数运达。11 月 11 日，又将新制棉衣万件附装太古公司“颍州”轮，由朱仲宾押运赴京散放⁵⁸。

石家庄为中国红十字会指赈之地，由蔡吉逢前往放赈。蔡到石后，会同当地士绅，采取如下急赈办法：以工代赈修复堤坝、桥梁、道路等水毁工程；搭建茅屋以为灾民栖息之所；掩埋尸骸；从寿阳、榆次等地购买小米 300 石赈饥⁵⁹。石赈于 10 月底结束，“地方非常满意。”⁶⁰11 月 4 日，石家庄商会王佩、周维新致电沈敦和副会长，深表谢意，同时以“此次灾民栖息所盖造甚为坚固，正定文若有西教士、石家庄林仁义西教士均来参观，且多主张附设工厂，俾此等灾民得以自谋生计。同人等已多方筹措开办经费，惟本镇自经大水后，劝募甚难。知我公救济情殷，拟请拨款留养此等灾民六月，每月约洋二百元即可敷用，余款归地方担任。始终玉成，感且不朽。”沈敦和当即复电：“每月计需留养经费洋二百元，准由敝会担任。”⁶¹

文安为红会另一指赈之地。文安地势卑下，形如釜底，积潦成灾，史不绝书。此次大水，全县 360 村，尽成泽国，淹毙居民无算。10 月中旬，红会放赈员蔡吉逢携款 5000 元会同官绅购粮放赈。10 月 25 日，总会总办事处托怡和公司“官升”轮装运棉衣 5000 件，发文安散放。惟文安“无地不水，无民不灾”，31572 户（153609 口），以每户赈粮 1 斗，即须 3000 石，每石红粮约 5 元上下，须洋 15000 余元。有鉴于此，11 月 20 日，总办事处在接到蔡吉逢灾情报告后，立即加拨洋 20000 元、棉衣万套，刻日汇运⁶²。文赈于 1918 年 1 月结束，“计查极次灾民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户，极贫每口散给红粮二斗，次贫一斗，棉衣每户二三套不等。查有被水溺毙者施棺掩埋，疾病不起者给药疗治，……城内粥厂补助红粮，左庄难民代盖芦屋，设立救护水船二十艘捞救落水之人。……复择适宜地设立第一二三灾民留工所，各筹数千元之款留养流离失所极贫之子弟，每所容留百人，限期五个月，给以口粮，聘工师，购机器，教以工艺，免目前之饿死，资将来之谋生。”抚绥周至，“灾民感激。”⁶³

武清由邓笠航负责施赈，据其灾情报告称，该县“房屋塌倒甚多，周回榆柳树皮均为灾民食净，惨苦之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鉴于灾情极重，10 月 29 日总办事处加拨 5000 元赶放急赈，加放棉衣 5000 件也于同日附装太古公司“奉天”轮起运⁶⁴。

赈灾行动仍在推进中。10 月 24 日，沈敦和副会长突接蔡吉逢来电，告知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熊希龄有意请红会担任文安、沧县、东光、玉田、徐水 5 县急赈。沈敦和表示接受。救灾恤难，本是红会天职，理当万苦不辞。25 日他致电熊希龄，“查文安本系敝会指赈地点，其余各县，既承尊嘱，自应勉力担任。”⁶⁵

玉田赈务由红会常议员施则敬力任其难，沧县、东光、徐水三县先拨洋 15000 元，分别派员前往查放（沧县、东光由红会与仁德堂联合办赈），10 月 30 日赶装棉衣 12000 件、面粉 2500 袋、饼干 13 箱，由招商局“新铭”轮运天津分发各县⁶⁶。4 县中，徐水灾情较重，1918 年 1 月 3 日，加拨 3000 元，以为难民留养之费⁶⁷。

徕县僻处荒陬，向称瘠苦。洪水暴发，“沿拒马河一带丁田庐墓冲刷一空，其子遗之民，

⁵⁷ 《红十字会赈务二则》，《申报》1917 年 11 月 4 日。

⁵⁸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1 月 12 日。

⁵⁹ 《报告石家庄水灾详情》，《申报》1917 年 10 月 10 日。

⁶⁰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0 月 29 日。

⁶¹ 《关于救灾善后之电稿》，《申报》1917 年 11 月 6 日。

⁶² 《红十字会办赈电稿》，《申报》1917 年 11 月 21 日。

⁶³ 《直隶文安县知事吴增兰公民郭铺等敬谢中国红十字会赈款》，《申报》1918 年 1 月 23 日。

⁶⁴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0 月 29 日。

⁶⁵ 《红十字会之赈务电稿》，《申报》1917 年 10 月 27 日。

⁶⁶ 《红十字会之赈务》，《申报》1917 年 11 月 1 日。

⁶⁷ 《红十字会加拨徐水赈款之复电》，《申报》1918 年 1 月 5 日。

率皆露处岳颠，啼饥忍冻。尼尼生息，绵缀残冬，开春以来，苦难尤甚，草根树皮，吞食殆尽”。红会放赈员蔡吉逢不避艰难险阻，会同保定、天津分会，分三路查灾，共调查 67 村灾民千余户，给赈无遗。同时以工代赈，筑堤挖河，修路架桥，并于城内设立留养习工所，其“寒儒孀妇残废等人加放重赈，体恤灾黎，无微不至。”⁶⁸

赈务尚未办结，新的灾难又发生了，1917 年 12 月底，安平县两次水淹之后，再遭“冰涨”之灾。据红会查赈员报告，“安平水又大涨，河冰冲裂三五丈不等，顺流而下，势若山崩，沿河老树多为摧断，其余冰床船只人畜什物，竟至一扫无存，确已伤人二千余名，盖近日天气奇寒，人一落水不溺毙，即冻毙，故伤人孔多。”⁶⁹总办事处闻讯，派员驰赴安平调查灾情，同时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续募直隶第三次水灾急赈》，呼吁海内善士“慷慨仁囊，共襄义举，以达救人救彻之目的。”⁷⁰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二次拨款共万元赈灾，派蔡吉逢“一力进行（放赈），如款尚不敷，准再加拨。”⁷¹

京直水灾赈济，衣食住统筹兼顾，繁难可知。由急赈而继以冬赈，计共散放赈款 112000 余元，棉衣 104000 余件，连同药品、面粉等，共合洋 220000 有奇。“后复力筹款项，散放春赈，拯彼青黄不接之厄，以达救人救彻之旨。”⁷²赈务持续到 1918 年春夏之交。在此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筹措万端，“日临总办事处，与理事长、各职员规划一切，募捐放赈兼营并筹，几逾半载，诚以京直水灾之重为百七十年以来所未尝有也。”⁷³红会上下同心，各慈善团体相互配合，协力以赴，取得了京直水灾救济的巨大成功。

京直水灾救济刚刚结束，湖南又告水灾。1918 年 5 月下旬，“湘省大雨如注，山洪暴发，省河漫溢。长沙、株州、醴陵、湘潭、宁乡、湘阴、湘乡等县，沿河皆被水灾。”⁷⁴夏秋之交，阴雨连绵，江水泛滥，华容、常德、宁乡、安乡、临湘、南县、沅江、湘阴、汉寿、益阳等县，“均被水灾，人民荡析离居，田庐牲畜，淹没殆尽。”⁷⁵湘省“连天锋镝，旋嗟匝地洪流”，令人浩叹，“望愁云之黯黯，痛浩劫兮茫茫，当非郑侠流民图所能穷形尽相者。”⁷⁶职责所在，痛痒相关，水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即在《申报》登载《敬募湘省水火刀兵之急赈》，“务祈薄海内外仁人君子痾瘝在抱（胞），饥溺为怀，不拘多寡，解囊慨助，多得一金即可多活一命，早施一日即可早救一人。”⁷⁷

灾难还在继续，乞赈函电纷至，“叠称湘省自兵燹后大水疫疠相继为灾，以致产米之区颗粒无存，数百万饥民嗷嗷待哺，惨不忍言，纷请迅筹赈济等语。”⁷⁸7 月 11 日，红会特开常议会，决议除 6 月已汇银 5000 元交由长沙分会赶放急赈外（旋追加 4000 元），再拨银 6000 元交宝庆分会刘直余就近向武冈采购谷米运宝平赈。随后，接受江趋丹建议，专门成立“湘赈干事部”，举交通部专门学校校长唐蔚芝和沈敦和为干事部长，阮子衡、聂云台、魏旭东为总干事，叶晴峰、张松亭为经济干事，购就四号大包面粉一万件并暑药、银洋、铜元、饼干、挂面百余箱，运往灾区散放⁷⁹。湘赈从 6 月开始到年底结束，前后用款约 60000 元⁸⁰。

1919 年入夏以来，湖北雨水过多，“襄水陡涨，加以川湘之水交并而至，又兼山洪暴发，以至滨临江襄各县堤防多被水灾。现在各县或以水涨堤危，或以水冲堤溃，或以被灾请赈各

⁶⁸ 《徕邑放赈告竣后之谢电》，《申报》1918 年 6 月 17 日。

⁶⁹ 《安平又发大冰之惨状》，《申报》1918 年 1 月 6 日。

⁷⁰ 《中国红十字会续募直隶第三次水灾急赈》，《申报》1918 年 1 月 9 日。

⁷¹ 《红十字会续拨安平赈款》，《申报》1918 年 1 月 24 日。

⁷²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17 页。

⁷³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6 页。

⁷⁴ 《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7 号，第 196 页。

⁷⁵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64、875 页。

⁷⁶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湘省水火刀兵之急赈》，《申报》1918 年 6 月 5 日。

⁷⁷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湘省水火刀兵之急赈》，《申报》1918 年 6 月 5 日。

⁷⁸ 《红十字会续放湘赈》，《申报》1918 年 7 月 12 日。

⁷⁹ 《红十字会湘赈进行》，《申报》1918 年 7 月 28 日。

⁸⁰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7 页。

等情纷纷呈报，计江汉道属则有夏口、汉川、沔阳、孝感、应城、安陆、圻春、黄冈、汉阳等县，襄阳道属则有天门、潜江、京山、钟祥、荆门、竹溪等县，荆南道属则有枝江、宜都、松滋、石首、江陵、监利、兴山、五峰等县，无不大水为灾，告急之文日必数起。”⁸¹中国红十字会得讯后，即分电湖北各分会“调查灾况，以凭散放急赈”，并商请南洋烟草公司先行筹垫洋万元汇鄂，“以应急赈。”⁸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卸任副会长职务的沈敦和，并没有歇手，9月14日，他借棋盘街496号民房，发起成立“湖北义赈会”，朱葆三和湖北驻沪募赈专员劳敬修为副会长，沈敦和则担任会长，继续为慈善事业挥洒热血。此举得到前总统黎元洪的赞赏，他在致沈敦和电文称：“诸公历赈偏灾，活人无算，兹为敝省设会筹赈，义浆仁粟，悉仗鸿施，谨代江汉灾民称谢。”⁸³

9月18日，总办事处开会讨论鄂赈事宜，决定由红会垫洋5000元汇鄂放赈，此款归入湖北义赈会名下，由沈敦和筹还⁸⁴。这意味着在湖北水灾的赈济中，沈敦和领导下的“湖北义赈会”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中国红十字会湖北各分会给予配合。

1920年是一个大旱之年，而水灾亦有发生。8月，浙江台州地区因“洪潮泛滥，巨浪奔腾，致旧台属之临海、黄岩、温岭、宁海等县一带，遍地尽成泽国，冲决塘堤数千丈，淹毁田地数万顷，庐墓人畜多有漂流溺毙。”⁸⁵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各慈善团体登报劝募捐款⁸⁶，量力救济。不久，湖北又告水灾，据《锡报》所载《荆州大水为患记》说，“荆州古称泽国，频遭水患，而尤以监（利）、石（首）为最甚。今年江水涨势，较往年为益盛，舒公堤（荆江大堤）本素号坚固，近已抢险多次，而水势不杀，距堤面不过尺余，苟继续增高者，则其危险殆难言状，缘荆城较堤身低洼故也。至荆属四十八垸，业冲坏二十余垸，其余能否保，尚难逆料云。”⁸⁷桑田沧海，嗷嗷哀鸿，待哺孔亟，沙市分会虽全力以赴，筹办急赈，无如灾民众多，杯水车薪，势难普济，8月31日急电总办事处求援，“谨代灾黎请命，电恳力予劝募，源源接济。”⁸⁸9月1日，总办事处接到“水灾乞赈”电后，即于9月3日《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劝募湖北上游水灾急赈启》，赶办急赈。

1921年夏、秋，“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灾区达二七000方里。”⁸⁹8省水灾，以江浙皖被灾最重，“沿江沿海百余县尽成泽国，遍地哀鸿。”⁹⁰中国红十字会有求必应，量力接济。7月20日，安徽凤台分会电告水灾，总办事处汇洋500元、空白章照20份由分会征收会费截流散放急赈；7月25日汇安徽正阳分会洋500元；8月19日汇安徽寿县现洋500元并于10月间派出由黄禹九医生率领的医队前往寿县疗治疫病；8月19日汇安徽太和分会洋500元，“令择赤贫者散放之”；8月间，寄安徽泗县空白章照40份，由分会劝募会费；寄江苏建阳分会空白章照50份，现洋500元；8月19日筹洋500元汇湖北樊城分会；8月30日筹洋500元助赈浙江宁波水灾；10月12日寄江苏阜宁分会空白章照30份；11月续拨江苏常州水灾药品，12月筹拨洋500元、棉衣200件助赈；12月2日汇江苏盐城分会洋500元⁹¹。

1922年浙江水灾，其中温州所属缙云、丽水“水灾甚重”，兼之“疠疫丛生，死亡相继。”

⁸¹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83—884页。

⁸² 《红十字会筹办鄂赈》，《申报》1919年8月26日。

⁸³ 《汇纪乞赈之函电》，《申报》1919年9月20日。

⁸⁴ 《赈务消息汇纪》，《申报》1919年9月20日。

⁸⁵ 《赈务通告》民国九年十二月五日，见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⁸⁶ 《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高邮醒迷僧经募明轩堂捐助浙省水灾洋五百元》，《申报》1920年8月26日。

⁸⁷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⁸⁸ 《沙市水灾乞赈》，《申报》1920年9月2日。

⁸⁹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42页。

⁹⁰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⁹¹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30—33页。

⁹²水灾发生后，浙江瓯海道尹林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以缙云、丽水两县水灾甚重，疠疫丛生，情极可惨，请贵会酌派救疫队，携带药品即日驰往，依法施治。”⁹³总办事处即于9月20日派出以潘佩声为首的救护队，乘“飞鲸”轮赶赴温州，医赈灾民⁹⁴。

1923年，湖北潜江县内江堤溃决，潜江分会全力赈救，并致电总会总办事处“乞赈”：“敝邑禹王庙、龙头拐相继溃决，田庐人畜，飘（漂）荡无算，敝邑及沔阳、监利、江陵各属，尽成泽国。敝会现正从事拯救，无如杯水车薪，殊不济事，务恳速赐急赈，以惠灾黎，无任盼祷。”⁹⁵总办事处表示给予支持。8月26日，总办事处接河南汜水县“快邮代电”告灾乞赈，言汜水山洪暴发，城池陷没。9月6日，总办事处即派开封分会出发赈灾。9月19日接开封分会来电，云汜水赈灾完毕，计救济3000余人，施款5000元⁹⁶。奉天安东县淫雨为灾，安东分会会同商会设立水灾临时救济会，派员乘船赴后沟、江岸、北坎子等处救护灾民，设救济所收容灾民2400余名⁹⁷。

1924年入夏以来，湖南淫雨不止，湘、资、沅三江及洞庭湖水暴涨，酿成自1906年以来“最大”之水灾⁹⁸，全省75县中，有70县被灾⁹⁹，灾民476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6¹⁰⁰。水火无情，湖南各分会义不容辞投入到灾害救济中，并纷电总办事处给予协助：

宁乡分会“快邮代电”称：“宁邑不幸，天降鞠凶……全区面积数百里，悉成泽国，所有人命牲畜、田屋桥梁及盖藏各物，悉行席卷，一无所有，溺毙生灵，不可数计，损失财产，千万以上，现虽水势退去，而被淹之区，尸骸狼藉，男女号泣，死生塞途，遍野哀鸿，嗷嗷待哺，伤心惨目，天地为愁，是亘古未有之奇灾、近今特有之浩劫。敝会派队冒险，多方营救，除于沿河救出灾民不计数外，在屋顶树梢救活者六百余人，并收埋溺毙尸骸数百具。刻下难民屯集城厢，已达数千，敝会议难坐视，一面设法救济，安辑流亡，一面分途出发，携款散赈。所虑者，灾区广大，饥巨痛深，并顾兼施，心余力歉。夙仰贵会痼瘵在抱（胞），已溺已饥，吁恳立予捐助，引手同援，并恳不惜齿芬，广为劝募，源源惠款，以拯灾黎。”¹⁰¹

宝庆分会电请急赈，云：“宝庆阴雨月余，洪水为灾。微日入城，东北埂垣，水逾数尺，附郭田原，悉成泽国，水毁房屋，淹毙人畜，不计其数，断绝交通，前后六日。四乡沿江灾情，迩正着手调查，尚未确悉。城区内外灾氓，露宿者三万余人，哭声彻夜，状极可惨。现河流虽平，而潮雨如故。水患未已，症疫又发，死者已矣，存者偷生。分会救灾防疫，曾出全力，惟灾情重大，莫补万一，吁恳仁恩，决施赈济，以苏孑遗，无任盼祷。”¹⁰²

衡山分会致总办事处“水灾乞赈书”疾呼：“山邑不幸，灾浸荐至，元气凋丧，公私俱穷。六月下旬，河伯肆虐，湘水深水陡涨数尺，高阜丘陵，悉成泽国，田土沙砾，庐舍丘墟，人畜压死，不可胜计，幸而生存，栖止无所，号泣悲哀，闻者塞耳。忆昔丙午初夏，洪水泛滥，田禾土产，栽种未久，再播再耕，生计尚有。今则禾谷含苞，土产结实，扼喉而吭，再无生理，哀我灾黎，何以堪此！敝会提倡拯救，绠短汲深，不能不将伯呼助。贵会痼瘵在抱（胞），饥溺为怀，务恳广为劝募，仁浆义粟，惠此灾黎，衡岳不骞，功德不朽矣。”¹⁰³

乞赈函电，纷驰而至，不能不引起总会的关注。其实，在水灾发生之初，总办事处在

⁹² 《晨报》1922年9月8日。

⁹³ 《中国红十字会为浙省温属缙云丽水水灾乞赈启事》，《申报》1922年9月7日。

⁹⁴ 《红会派员救护温州水灾》，《申报》1922年9月21日。

⁹⁵ 《湖北潜江县江堤溃决告灾电》，《申报》1923年8月23日。

⁹⁶ 《河南汜水县水灾救济会告灾》、《开封分会救护汜水县水灾》、《复河南汜水县各公团告灾代电》、《开封分会救护水灾告竣》，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106、108、110页。

⁹⁷ 《奉天安东分会救济水灾之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131页。

⁹⁸ 《晨报》1924年7月28日。

⁹⁹ 《大公报》1925年4月11日。

¹⁰⁰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¹⁰¹ 《宁乡红会请赈灾民》，《申报》1924年7月12日。

¹⁰² 《湖南宝庆水灾之呼吁》，《申报》1924年7月29日。

¹⁰³ 《衡山红会之水灾乞赈书》，《申报》1924年8月2日。

“闻湖南宁乡水灾奇重，情形极惨”时，即“特电湘省红十字会派员前往灾区，详查电复”。7月初，“筹得赈款，由银行汇寄湘省，赶赴宁乡散放。”¹⁰⁴随着灾情的持续与扩大，总办事处罗掘俱穷，遂不止一次在《申报》等媒体劝募捐款，同时“分电各处分会，对于灾区救济事务，嘱为极力进行。至应用药品、赈款，均由该会总办事处直接汇寄各处分会散放。”¹⁰⁵当然，由于江浙战争爆发，总会全力救护战灾，而对湖南等地的水灾救济，只能量力而行了。

1925年，红会忙于战灾的救济，对河北、山东、广东等地的水灾，不遑兼顾。

1926年，山东大水，又兼黄河漫口，一片汪洋，“约计全省一百余县，几无一不在被灾之中，亦无一不在待赈之中。”¹⁰⁶其中济宁“灾情最重”，“平地水深数尺，非船不能通行，房屋倒塌无算”，灾民“上被雨淋，下被水没，无衣无食，难卧难坐，男号女哭，惨不忍闻。”¹⁰⁷济宁分会全体会员不分昼夜，乘船救出难民数千人，收容妇孺数百人¹⁰⁸，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增色不少。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水灾的救济，几乎年年从事，虽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历年有所不同，虽然所提供的救助可能是杯水车薪，但对灾民的慈善关怀，却是令人难忘的。人道主义甘霖滋润心田，鼓起他们生活的风帆，其效应并不比红粮、饼干稍逊。

二、旱灾的救济

旱灾“莅临”之常，虽然没有水灾频繁，而其为祸之烈，有时较水灾犹过之。如果说水灾具有“突发性”特点，那么旱灾则是“渐进式”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尽管旱灾救济显得不若水灾救济紧迫，但一旦成灾，仍然刻不容缓。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此淹彼旱，极为常见。骄阳似火，烈日如焚，大地龟裂，赤地千里，为大旱之年惯见而又令人生畏的惨象。旱魃肆虐之下，饥谨随之，蚕食生灵，饿殍满地，不堪言状。人道攸关，中国红十字会对旱灾的救济亦尽力为之。

1913年徐州利国驿及山东韩庄等处，兵燹之后，继以旱荒，十室九空，哀鸿无告。中国红十字会常议员施则敬“戚焉悯之，爰垫巨款，征募棉衣”，派员驰赴灾区“核实散放，全活灾民甚众。”¹⁰⁹这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济旱灾之始。

1914年至1919年，烽烟四起，兵燹时闻，水灾、疫情此消彼长，旱灾相对较轻，中国红十字会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兵灾、水灾及疫灾的救济上，也是极其自然的，而对旱灾，则力所不逮。直到1920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旱灾，中国红十字会才重新启动对旱灾灾民的救援。

1920年，黄河流域天干地燥，亢旱异常，直、鲁、豫、晋、秦5省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灾。”¹¹⁰东起海岱，西达关陇，南至洛阳，北抵京畿，禾苗枯槁，赤地千里。灾民“统计亦不下三千余万人。而此等灾民生活状况，始犹采摘树叶，参杂粗粮以为食；继则剥掘草根树皮，和秕糠以为生；近则草根树皮搜掘殆尽，耕牛牲畜屠戮无遗，遂至典卖儿女，青年女子不过十数元，不及岁者仅值二、三元。又其甚者，或因出外逃荒，将幼儿抛弃，或因饥饿不能出门户，合家投缳自尽。此外逃赴未被灾各地者，经过京汉、津浦、京奉、京绥各路

¹⁰⁴ 《红十字会救济宁乡水灾讯》，《申报》1924年7月6日。

¹⁰⁵ 《红会对各省灾区之救济》，《申报》1924年7月31日。

¹⁰⁶ 《晨报》1926年8月17日。

¹⁰⁷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¹⁰⁸ 《中国红十字会济宁分会济宁水灾急赈募捐启》，《申报》1926年8月29日。

¹⁰⁹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¹¹⁰ 《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申报》1920年9月14日。

(车)站,日有数起,扶老携幼,露宿风栖,嗷嗷待哺之声,尤属惨不忍闻。”¹¹¹

如此奇重之灾,举世震惊。鉴于“北五省灾荒频仍,饥民流离失所,惨不忍言”,北京各慈善大家于9月11日集会于熊希龄府,磋商“救济”之法,决定联合各慈善团体,共组“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举前总统黎元洪及梁士诒为名誉会长,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大燮(不久即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副会长,以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会所,“当由到会发起诸君公捐四千余元,以为提倡,即日组织成立,积极进行。”¹¹²这预示中国红十字会将在这次旱灾救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0月1日,北京各救灾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北方救灾总会”(10月6日与万国救济会联合组织“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公推梁士诒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副会长蔡廷干为副会长。就是说,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活动纳入“救总”系统,合力遂行。

北五省灾民数千万,赈济之款,“须有二万万元,方能济事”¹¹³,红会自身无能为力,只有向社会“劝募”。9月23日,《申报》刊出了《中国红十字会劝募七省灾民急赈启》,云:“本年入春以来,雨泽稀少,北方各省旱象早成,夏秋之间或罹兵燹,或被蝗蝻,载道流离,赤地千里,灾区宽广,为数年来所未有。被灾之民,树草食尽,十室九空,卖妻鬻子,偷生旦夕,情状凄惨,殆不忍言。浙湘等省,或遭水患,或受兵灾,待哺嗷嗷。哀鸿遍野,转瞬冬令,饥寒交迫,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而为匪,目击灾情,能无心恻?迭据各省官绅函电到会,除分行(电)分会调查灾况筹办急赈外,伏乞各界仁人君子,大发宏愿,慷慨解囊,不论金钱、衣物、首饰、古玩、书画,凡有施舍,皆可充赈,所愿诸公痼瘵在抱(胞),饥溺为怀,义粟仁浆,源源施济,俾救数千万灾民出水火而等衽席。”¹¹⁴为收到更好的劝募效果,中国红十字会还将“调查灾区实况,摄影制成铜版,加以说明书,印发各省张贴,并撰浅俚文言乞赈歌二首,印成传单散布。”¹¹⁵其中一首歌词云:

北方旱灾遍五省,蔓延直鲁豫陕晋,
饥民数达三千万,四五十年耳未听。
说起灾情实惨伤,玉米豆麦棉高粱,
颗粒无收不得食,树皮草根争相鬻。
农民无力养妻子,投井悬梁自寻死,
牛羊驴马价最廉,儿女贱卖不值钱。
饥躯奔走将远徙,旅费缺乏坐待毙。
我今且说避灾民,夫携妻妹到天津,
三人饥饿四五日,路途叫卖馍馍人。
其夫取出四铜子,买得馍馍夫妇分,
阿妹饿极无钱买,夺取数个忙咽下,
卖主争论向索钱,旁有好善代付价。
三人幸得腹一饱,小妹哭啼牵衣道,
哥哥不能养活我,请君慈悲一援救。
道旁太息更咨嗟,力劝善人携还家。
又闻灾民两夫妇,手携孩童年四五,
父欲弃儿不一顾,母不忍抛抱持哭,
霎时将身悬高树,夫不见妻猛回看,
伤心妻命已黄泉,可怜夫亦同时缢树下,

¹¹¹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¹¹² 《筹议救荒之各面观》,《申报》1920年9月15日。

¹¹³ 《锡报》1920年9月16日。

¹¹⁴ 《中国红十字会劝募七省灾民急赈启》,《申报》1920年9月23日。

¹¹⁵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仅留一童稚， 叫号跳踉不忍闻。
灾民情况类如是，呜呼此言过路人。
灾区情形实更炽，北京筹设救济会，
外人亦开赈灾议，海上不乏慈善家，
好善之诚岂独后？我思豪富极奢侈，
酒肴动辄百金费，更有杂项可省处，
日日消耗不少钱，诸公苟能稍节省，
灾民已可活多命，奉劝男女各同胞，
大发善心与宏愿，不论金钱或衣饰，
慷慨解囊毋吝惜，众擎易举腋成裘，
施舍灾民都得食，此中造福实靡穷，
功德无量万口同。¹¹⁶

这首《红十字会为三千万灾民含泪乞赈歌》，如泣如诉，震撼人心，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这对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赈灾无疑是有力的推动。

总会在呼吁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参与赈灾的同时，还动员各地分会积极行动，群策群力，协力推进。9月23日总办事处向各分会发出通电，号召：“红十字分会鉴：直鲁豫陕晋北五省，亢旱成灾，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哀鸿遍野，待哺嗷嗷，……本会天职所在，自应协济，惟灾深地广，非有大宗捐款，难期普及，务望我分会同仁，大发慈悲，就地协力劝募，源源解沪，以便汇送灾区，藉资散放，分电特达，立盼鸿施。”¹¹⁷

赈款是灾害救济的基石。为筹集赈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分会除在国内募捐外，总办事处还借助传媒向海外劝募。此外，多次延请上海四大舞台艺员义演助赈¹¹⁸。“从我做起”的示范也很重要，据9月26日《申报》报道，中秋佳节，红会医院同人特省节宴折资作为赈捐，“住院病人亦受感应，多节其家庭宴饮，将费助赈。”¹¹⁹9月28日《申报》报道《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定期闭幕》说，“该院同人并以灾民待赈孔亟，将例有节宴二桌折资移作赈款，闭幕时所有费用，亦求节省，以之捐入赈项中。”¹²⁰红会身体力行，经传媒报道，赢得社会各界的交口称颂，产生良好的“感应”之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红会募捐赈灾打出一个小小的高潮，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记载，“计是年共拨过救护兵灾国币五千六百五十元，水旱灾七万七千一百元，救护药品一千五百元，共计灾赈实款八万四千一百五十元（应为84250元——引者），棉衣裤八千件。所以赈款，除由上海办事处迳交各省驻沪义赈机关代收转解外，余均分别解交北京总会及华洋义赈会，汇解散放。”¹²¹

在北方五省旱灾的赈济中，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救灾总会”的发起人之一和主要参与力量，与其他各慈善团体精诚合作，同心协力，联合行动。同时，“特派救济队数队，分赴灾区，从事救济；开设诊疗所计有三处：（一）北通州临时诊疗所；（二）保定临时诊疗所；（三）大名临时诊疗所，均经组织完善，在该处从事救济，每日诊视灾民，为数甚多，并加施种牛痘，更形忙碌。”¹²²总会及分会在这次旱灾救济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是引人注目的。

1921年夏，湖南久旱不雨，旱魃为虐，烈日似火，田地焦灼，禾苗枯槁殆尽，“草皆赤焦”¹²³，灾情极重，“报告旱灾者，全省有五十余县之多，收获多者三四成，少者只一二成，

¹¹⁶ 《申报》1920年9月22日。

¹¹⁷ 《申报》1920年9月24日。

¹¹⁸ 《中国红十字会为天蟾舞台全体艺员演剧助赈启》，《各方面之筹赈声》，《四大舞台合演助赈》，见《申报》1920年10月19日，10月23日，11月4日。

¹¹⁹ 《各方面之筹赈声》，《申报》1920年9月26日。

¹²⁰ 《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定期闭幕》，《申报》1920年9月28日。

¹²¹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27页。

¹²²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476页。

¹²³ 《大公报》1921年8月19日。

尤以湘西为最”，“全省饥民近二百万。”¹²⁴饥民室如悬磬，“争食树皮草根，饿殍载道”¹²⁵，惨不忍睹。6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特拨永顺、宝庆分会款各2000元，以赈济灾黎，云“湘省被灾，情状至惨，本会当尽力补助。”¹²⁶8月30日，总办事处在接到耒阳、平江乞赈电后，立即各拨500元助赈。在复平江分会函云：“平江亢旱成灾，本会良深悯念，极应设法筹赈。惟是各省兵灾水灾，迭起循生，各分会函电交驰，纷纷告急。而本会基金毫无积蓄，劝捐久成弩末，无任惶歉。兹于无可设法之中，勉筹现洋五百元，又空白佩章凭照二十份，望即募集会员，照章征收会费，一并截留，量予择尤赈济，并将办理情形报查为禱。”¹²⁷兵灾水旱，迭起循生，筹款为难，道出了总会无力专注旱灾救济的苦衷。

1922年，虽然湖南旱灾缓解，但仍有部分地区创痍未复。5月5日，总会总办事处收到江西省临川县李家渡桂为棠函，内附湖南省耒阳县同善分社印刷的“募捐通函”，称耒阳“连年大旱，秋后歉收，才草尽枯，去岁尤甚，米贵如珠，已为亘古未有之奇荒，加有供给不敷需要之大势。哀我元元，生机奚恃？”这个“通函”引起总办事处的关切，当日致电耒阳分会会长谢炳彝，询问“耒阳灾情究竟何若？同善分社印刷通函，到处募捐，赈济办法是否得力？”如有“应予援助之处，务望协同设法为要。”耒阳分会按照总办事处的要求，协助同善分社赈济灾民¹²⁸。而这年秋，湖北遭遇旱魃，到冬季越发严重，“地赤已经千里”¹²⁹，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仅见，被灾地面占全省三分之二以上。”¹³⁰粮食奇缺，物价腾涨，米珠薪桂。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从沙市云锦碾米公司购米4000袋，运宜昌平糶¹³¹。

1922年，河南秋旱，收成歉薄，导致1923年春荒。河南南阳、灵宝、许昌等分会或设粥厂，或购食粮，赈济灾民。总会总办事处给予一定关注，3月26日，致电山西督军阎锡山，请为灵宝分会购粮救荒开绿灯，电文称：“山西太原阎督军大鉴：据湖（河）南灵宝红十字分会来电，以豫境旱荒，民食告绝，拟赴晋省河东道属各县，采购粮食，运灵平糶，请转电督署，施恩逾格，暂行弛禁，令行河东道尹，飭属验放，以济饥黎等语前来。除函复由灵宝县知事备具护照呈文注明石数投辕请求采购外，特此电达，伏乞俯准，同深感荷。”¹³²表达了中国红十字会灾民的牵挂之情。

1924年，陕西、山西、甘肃、吉林以及江苏、四川、云南部分地区旱情严重，总会因全力投入战灾救护而无暇顾及。

1925年，战灾救护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对旱灾，总会还是尽可能的给予救济。本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连续几年干旱少雨，终于衍成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据《晨报》报道，四川“三年来均遭荒旱者实居多数，……不特被灾各县，室如悬磬，即素称肥沃地方，亦野无青草。”¹³³灾情之惨重，触目惊心，“综计全川饿死者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病者约二十万人，至于转徙流离，委填沟壑者，在六七十万人以上。灾情极重者，亦达三十六七县。有争掘草根杀伤人命者，有攫食黄泥，名观音粉，腹塞而死者，有饿逼自缢或投河者，有先杀儿女再行自食（尽）者，有全家服毒同死者，有聚众向官索食，求予枪毙者，有相（食）

¹²⁴ 《湖南省志》第1卷，第464页，见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0页。

¹²⁵ 《申报》1921年9月22日。

¹²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¹²⁷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31页。

¹²⁸ 《本会设法赈救湖南耒阳奇灾》，《耒阳分会来电》，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24、28页。

¹²⁹ 《大公报》1922年12月30日。

¹³⁰ 《晨报》1923年3月2日。

¹³¹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复沙市分会电》，《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复宜昌分会电》，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38页。

¹³²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电山西阎督军为灵宝分会购米救荒》，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70页。

¹³³ 《晨报》1925年5月16日。

率逃亡，估吃大户，死亡载道者。”¹³⁴种种惨象，笔难形容。

饥荒年岁，食料缺乏，物价飞涨，如川东达县，“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人民赖以延残喘者，惟靠草根树皮，及数千里外运来极有限之谷米、杂粮而已。此种粮食运至该地时，价值至昂，计每斗米须大洋六元左右，每斗杂粮需五元左右。因之该地近八、九月间饿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而近来甚至每日必死数十人。”¹³⁵因此，购粮平糶紧迫而不容稍缓。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委托夔州分会救护队长蔡云樵前往宜昌采买赈米万石，并于5月2日致电北京税务督办“俯念灾民”，请转飭宜昌关税务司，请予“免税放行”，得到允准¹³⁶。除此之外，总办事处还为贵州旱灾灾民捐助赈款1000元。

1926年至1927年遭受旱灾的省份有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山西、直隶、安徽等省。由于战灾救济等方面的原因，总会总办事处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救助。

总的来说，尽管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对旱灾的救济不若兵灾、水灾救济来得踊跃，但还是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关注，特别是对北五省旱灾的救济，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三、其他灾患的救济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多灾多难，天灾人祸，层出不穷，陷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红十字会本博爱襟怀，对于遭受刀兵水火之外各种灾患的难胞给予物质救助和精神慰藉，让他们生活充满阳光。

1915年7月27日晚，上海骤起狂风，“当风力最猛之时，吹坍房屋不少，其船只之遭险，电杆之被折者，亦不计其数。……黄浦江中小民小船冲翻沉溺者甚多，查至二十八号午刻为止，计有二百余艘，溺毙男女人口不少；沿浦滩所览电灯电话杆木，被风吹倒折断者，约有一百余根；房屋墙壁吹坍者亦颇不少。……闸北药水厂北面且有潮水上岸，冲去茅棚一百余间，瓦屋数十间，其他各处茅棚亦都被冲。……沿路之树亦为风拔起，受伤者约数十人。……又闻闸北共和路塌倒房屋数十处，新闸路川虹浜平屋吹塌墙壁数十处，其他如西藏路、大庆里北、福建路、云南路、九江路等处倒塌房屋。……大南门外江北贫民所搭之草屋平屋，均遭风坍毁”¹³⁷，“风灾之大为数十年所未有。”¹³⁸上海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所在地，救济上海风灾，更是责无旁贷。救护医队迅速组织起来，队员顶着疾风暴雨，分南北两队，随带粮食、药物，奔赴现场，散放急赈，“伤者为之医疗，并送本会医院留治，死者为之棺殓掩埋以妥魂魄，并清查被毁草房以筹善后方法。”¹³⁹善后救济工作在次日午后风停雨止后展开，一方面，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筹办上海风灾贫民急赈募捐广告》、《中国红十字会谨募上海风灾贫民急赈》、《中国红十字会经募本埠风雨奇灾平糶急赈》等募捐广告，另一方面散放急赈，并于7月29日发放米票，“以便就近领米充饥。”¹⁴⁰同时发给灾民赈票，大口每名钱400文，小口减半，被毁草棚每座赈洋4元，从8月2日起至6日在南市医院及二马路总办事处发放¹⁴¹。据报道，8月2日放赈第一天，“灾民扶老携幼，络绎而至，……共有大小灾民四千余口。”¹⁴²8月3日、11日，相继在南市龙王庙、闸北开办平

¹³⁴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¹³⁵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4—635页。

¹³⁶ 《红会赈济川灾之两电》，《运米赈济川灾之红会消息》，《申报》1925年5月5日、27日。

¹³⁷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42页。

¹³⁸ 《中国红十字会筹办上海风灾贫民急赈募捐广告》，《申报》1915年7月29日。

¹³⁹ 《申报》1915年7月29、30、31日。

¹⁴⁰ 《沪南访函》，《申报》1915年7月30日。

¹⁴¹ 《中国红十字会定期散放本埠风灾急赈》，《申报》1915年8月1日。

¹⁴² 《红十字会放赈》，《申报》1915年8月3日。

巢所¹⁴³。放赈、平巢，被风灾民赖此度过难关。

1918年2月13日，广东潮梅各属惨遭地震，“巨声如雷，震澈（彻）遐迩”¹⁴⁴，“汕头一隅民房商店圯坍十之六七，人民压毙及伤残者不可胜数。其幸存者，无处逃生，鹄立海滨，风餐露宿，连日继夜。潮安、澄海、揭阳、饶平亦同此惨状。且各属堤基崩裂，春水将至，横决可虑。其尤惨者，南澳县屋宇夷为赤地，人民死伤十分之八，尸压败垣，无人收葬。”¹⁴⁵2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接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巧（2月18日）电”，沈敦和副会长当即拨垫银2000元汇刘镇守使散放急赈，并致电汕头分会“调查详细灾情并设法劝募，冀集有巨款以谋善后。”¹⁴⁶

本年入秋以来，疫病流行，浙江宁波、绍兴一带疫患尤烈，据10月19日《申报》报道说，该疫“初起时类似伤风，如带咳嗽，命尚可延，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绍兴有的地方“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¹⁴⁷令人不寒而栗。疫患引起总会总办事处的关注，19日，沈敦和副会长特致电绍兴柯桥红十字分会倪仲敬，云：“顷见各报载有绍属上虞西乡发生剧烈之时疫，死亡无数，延至宁属，苦无医药等情，请即查明病情电示，敝处立派王医生培元带医队及医品来绍救治，务请设法照料。”¹⁴⁸22日，总办事处即派出以曹思劬、谢筠寿、李家骥、林春山、鲍康宁等医生组成的救疫医队，乘宁绍轮船前往上虞救治患者¹⁴⁹。

10月23日，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致函中国红十字会，以“余姚一县疫势现正蔓延，无法遏止，用特仰恳尊处迅派医员，克日专赴余姚一县施治，俾得早杜疫患。”¹⁵⁰次日，总办事处组织第二医队，以王培元为领队，“带有济生会特制救疫灵丹三千瓶”，奔赴余姚¹⁵¹。

时疫仍在蔓延。10月30日，湖州辅善会会长谭德润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求救，云该地“天气亢旱，时疫盛行，其传染之速等于影响，以致死亡枕藉，不下绍属。近日南乡一带，如菱湖、双林、荻港等镇，棺材均已卖空，故生者之恐慌，如有倒悬之厄，而扑灭方法仍乏把持。敝会施药联单虽已送尽，而苦无良医救治，效果不生，惟有请求大会派医生来湖施救。敝处已备临时治疫事务所，代为布置一切，如蒙许可，祈先行函复，俾慰湖人云霓之望，则全邑铭感。”¹⁵²沈敦和接信后，立即复函，并筹备救护。11月3日，由总办事处从杭州医生处借调的医生刘冰心、药剂师章德钦等组成的第三医队，乘小轮从杭州驶往湖州救疫¹⁵³。

湖州时疫未杀，宁波疫告剧。总办事处复聘请医生杨任林、药剂师蔡金鑫组织第四医队，于11月6日乘“江天”轮船驶往宁波救治。“疫症四起，该会派医配药，大有应接不暇之势。”¹⁵⁴

4个救疫医队，在当地慈善组织的协助下，迅速控制了疫病的蔓延，20余日，共治愈疫病患者6000余人¹⁵⁵。安徽凤台、蒙城、桐城、祁门、宁国、芜湖、六安、青阳、绩溪、

¹⁴³ 《中国红十字会定期开办本埠第一平巢所募捐启》、《中国红十字会开办本埠南北市风灾平巢募捐》，《申报》1915年8月1日、10日。

¹⁴⁴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71页。

¹⁴⁵ 《中国红十字会敬募广东潮梅地震急赈》，《申报》1918年2月26日。

¹⁴⁶ 《红会拨垫地震赈款》，《申报》1918年2月23日。

¹⁴⁷ 《绍属时疫剧烈之来函》，《申报》1918年10月19日。

¹⁴⁸ 《红会医队赴绍救疫》，《申报》1918年10月20日。

¹⁴⁹ 《宁绍时症流行之救济》，《申报》1918年10月22日。

¹⁵⁰ 《红十字会近事两则》，《申报》1918年10月23日。

¹⁵¹ 《红会救治绍疫第二医队出发》，《申报》1918年10月24日。

¹⁵² 《红会救治时症之忙碌》，《申报》1918年11月2日。

¹⁵³ 《红十字会纪事三则》，《申报》1918年11月4日。

¹⁵⁴ 《红会救治浙疫消息》，《申报》1918年11月6日。

¹⁵⁵ 据统计，第一医队治愈2000余人，第二医队治愈1987人，第三医队治愈1200人，第四医队治愈1000余人（见《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19页）。

屯溪等地时疫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虽没有派出救疫医队，但寄去“济生丸”，委托分会散放，予以救治¹⁵⁶。此外，对10月28日湘潭火灾给予关注，从湘赈款下支款资助湘潭分会的难民救助工作¹⁵⁷。

1919年，局部地区仍有疫疔流行，如安徽滁县，夏季“时疫大作”，中国红十字会滁县分会组织时疫诊治所，从事救护，英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亚细亚洋油公司予以资助¹⁵⁸。山东济宁疫患，总会总办事处提供“济生丹”。疫患之外，吴淞发生火灾，吴淞分会赈济难民，“极贫者棉衣一套，米八升，次贫者六升，商人不愿受衣米者，每人借以十元二十元不等。”¹⁵⁹

1920年9月，浙江南浔霍乱流行，“死亡日众”。9月15日，总会总办事处接南浔自治办事处“请贵会速组临时救疫队莅浔施救”求援电后，即派出以北市医院徐兆蓉医士为领队的救护医队附轮前往南浔救治¹⁶⁰。

1921年，皖北大水之后，疫疾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于10月15日派出以黄禹九医生为领队的救疫医队赴寿州“急施疗救，两月以后，始告肃清。县知事程鉴，率地方各团体致电申谢。”¹⁶¹

本年11月12日，上海闸北邢家木桥一带发生火灾，数千间棚屋顷刻化为灰烬，烧死22人。中国红十字会闻讯即派员赶赴火场调查，“其景象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至于烬余之民无家可归者不下三万名。”¹⁶²17日，红会散放银圆、棉衣救赈，21日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劝募闸北火灾急赈启》，呼吁上海市民伸出援助之手。

1922年3月20日，上海虹口分水庙住户因“午炊不慎”引发火灾，“当时风势甚大，以致被灾各户，仓皇失措，无从扑灭”，造成77户341口被灾；22日，胡家木桥住户“因夜间烧饭遗火于薪，遂成燎原之势”，103家477口被灾。“两处居民，大概（多）为劳苦工人，男以推车做工，女以缝衣缁丝度日者居多。此次被灾各户，有因出外谋生而家门闭锁者，有仅留小孩在家男女出外者，及收业回家，已成灰烬，可谓惨矣。”¹⁶³火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于3月27日《申报》刊发《中国红十字会为被火灾民募捐启》，为“劫后之遗”的难民筹募赈款，按名放赈，共施现银2000余元，“灾民各沾实惠，颇为感激。”¹⁶⁴

同年夏秋，皖北亳县、蒙城、涡阳霍乱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派出“防疫团”前往救治，蚌埠分会会长邓愚山（拙斋）协助尤力，“备著勤劳”，皖北地方官绅均具函申谢，如《亳县各公团致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函》称，“天祸亳民，疫氛蔓延，因而致死者，日难屈数。嗣经蚌埠贵分会邓（拙斋）、李（振九）诸先生到毫，旬日之内，全活者何止千百。敝县感戴大德，莫可名言。兹谨略述数语，乞转致各报登载，用当奉扬仁风耳”；《蒙城谢蚌埠分会防疫团函》亦称：“今值盛夏，瘟疫时行，大概情形，不外霍乱瘧螺等类，或朝染而夕死，或暮染而朝亡，踵不及旋，医药罔效，以致死亡枕藉，目不忍睹。敝邑之中，人人自危，无法可施，幸蒙贵分会会长邓、医长李两先生大驾来蒙，施药诊治，每日户限为穿，昏夜求诊者尤众，计来蒙数日，治活大小男女五百人，诚为有脚之阳春施以无形之甘露也，谨此鸣

¹⁵⁶ 《安徽凤台亦有疫症》，《时疫纷纷求医》，《桐城告疫》，《安徽祁门报告患疫》，《安徽疫讯》，见《申报》1918年10月27日，11月3日，11月5日，11月7日，11月20日。

¹⁵⁷ 《湘潭火灾之求赈》，《申报》1918年11月12日。

¹⁵⁸ 《滁县红十字分会鸣谢》，《申报》1919年10月25日。

¹⁵⁹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20—21页。

¹⁶⁰ 《红会医士赴南浔》，《申报》1920年9月16日。

¹⁶¹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30页。

¹⁶² 《中国红十字会劝募闸北火灾急赈启》，《申报》1921年11月21日。

¹⁶³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21—22页。按：关于分水庙火灾的时间，3月27日《申报》报道为3月21日；关于胡家木桥火灾受灾人数，《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35页记为471口。

¹⁶⁴ 《红会赈济被火灾民纪》，《申报》1922年3月30日。

谢。”¹⁶⁵为表彰邓拙斋的救疫殊勋，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决定授与其“头等纪念章”，以昭激励¹⁶⁶。

1922年，对广东沿海民众来说，是一场大浩劫。8月2日午后，飓风突起，风狂潮卷，酿成沉灾。据报道，汕头“倒塌屋宇无数”；潮安“船只损失大小百余只，淹毙水手不下千人”；潮阳“江河水涨数丈，平原变成泽国”；揭阳“满城瓦砾横飞”；澄海“竟有全村人命财产化为乌有者。”¹⁶⁷飓风中遇难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澄海县属约死六万余人，汕头市约死五千余人，饶平县属约死六千余人，潮阳县属约死五千余人，揭阳县属约死千余人，潮安县属约死五百人，普宁县属约死百余人，南澳县属约死二百余人，惠来县属约死百余人。……死者既多，何以觅得棺木，若澄海之沿海岸，有掘一大砂窟，即葬百数十人者，可谓惨矣！而牲畜之死亡殆尽，横街塞项（巷），恶臭逼人。”¹⁶⁸至于财产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仅汕头一地，“估计约在三千万以上”，“无家可归者约数千人。”¹⁶⁹

“八·二风灾”，潮汕等地“铺屋倒塌，船艇漂陆，死亡枕藉，哀鸿遍地，耳闻目见，不寒而栗，诚亘古未有之奇殃，阖潮弥天之浩劫也。”¹⁷⁰灾情发生后，乞赈函电，纷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总办事处迅速作出反应，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拯救潮汕风灾乞赈启事》¹⁷¹募集捐款的同时，于11日派出医生郁廷襄、沈嗣贤、看护钱宝珍、潘遵福、张一鸣、张永清、刘宣辅、魏宝兴、陈国宝等9人组成的医队，乘“苏州”轮前往香港，转赴灾区¹⁷²。惟“灾地甚广，灾民甚众，灾情甚重，所带药品，不敷应用”，红会不得不于26日加派第二医队（以施兆堂为领队），携带药品数箱，搭乘太古公司“新宁”号轮，乘风破浪，驶往汕头增援¹⁷³。

善款为人道救助之保障。虽然总会拯救风灾难民乞赈呼吁得到回应，如《申报》载有《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黎集云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五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存心子经募慰记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孙月三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三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喜闻过斋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周龙章君经募偷生氏蔡静记二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共洋二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陈庸庵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二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孔金声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裘焜如君经募延年子大善士捐助潮汕安徽灾赈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鲍子丹大善士筵资助赈潮汕水灾洋一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吴熙元孙贞道安定根经募韩国赤十字会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等征信广告¹⁷⁴，虽然红会中人亦纷纷解囊，如理事长庄录捐助洋200元¹⁷⁵，但所筹款项，仍属杯水车薪。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特于8月21日致电中央政府，为灾民乞赈，电文称：

“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并分送税务处孙督办、北京红十字会汪会长、蔡副会长鉴：汕头飓风为灾，全埠房屋倒塌，伤毙人口三千有奇；潮属沿海乡村被水漂没，淹毙乡民约及十万。灾区广大，灾情奇重，为历来所未有。该处现正筹办急赈，无如灾广费巨，募捐势成弩末，拟恳政府一视同仁，商明各国驻使，援照直北加捐赈济成案，饬令总税务司，先就汕头进口货物附加一成赈捐，由潮汕关税司征收，交汕埠筹赈绅商，核实赈济以救沉灾，谨为灾

¹⁶⁵ 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45、47页。

¹⁶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页。

¹⁶⁷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¹⁶⁸ 《大公报》1922年9月6日。

¹⁶⁹ 《申报》1922年8月10日。

¹⁷⁰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82页。

¹⁷¹ 《申报》1922年8月10日。

¹⁷² 《红会医队出发》，《申报》1922年8月13日。

¹⁷³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汕灾》，《申报》1922年8月26日。

¹⁷⁴ 《申报》1922年8月15日、18日。

¹⁷⁵ 《申报》1922年8月13日。

民九顿首以请。”¹⁷⁶

总办事处的上述请求，得到支持，经内务部税务处核准，关税拨用附捐 10 万元，作为汕头赈灾费¹⁷⁷。这对灾民来说，不啻为福音。

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八·二风灾”行动仍在推进中。在赈灾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南海分会、汕头分会、澄海分会、番禺分会，均积极参与，量力协助¹⁷⁸。其中澄海分会即岭东分会，“协助尤力。”¹⁷⁹

澄海分会自飓风乍起时，“全埠电灯失光，莫名真相，救护方法，极难下手，迨夜深，本分会幸墙垣坚固，不至倒塌。爰督役冒险，就本分会附近铺屋倒塌露天浸水之男女，极力救护，即将本分会看症房开辟，吸纳安藏达旦。翌早，即由理事黄作卿、医务长吴济民率医队，巡行全埠救伤，医治无数，三四五等日继之。”¹⁸⁰旋接各灾区来函，请派医队救护。澄海分会即“赶办医队出发，由队长颜钦洲、医长吴济民，率队前往，按定报告灾区，挨次出发，以期救灾恤邻，不分畛域。”¹⁸¹第一次出发鮀江灾区，“求救者纷至沓来”，共医治 200 余人；第二次出发潮阳，“附近灾区挨次救护”，救治男女 290 余人；第三次出发外砂、莲阳等处，共医治 430 余人；第四次出发潮安、东陇等处，“沿途施医”，统共医治男女 279 人；第五次出发鸥汀乡，由辛子基领队，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特派医队会合，于辛氏大宗祠开办临时医所，医治因灾被伤难民多人；第六次配合总办事处医队再往鹄江区、大场乡等处，开办临时诊所，并逐日派医员“循环巡医”，统计 10 余天医治数百人；第七次总办事处医队开赴潮阳，借林氏洋楼开办临时医院，澄海分会“仍派员帮忙焉。”¹⁸²

“八·二风灾”救护，持续月余，救死扶伤数千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在救护兵灾及他处自然灾害的同时，筹款募捐，为灾民请命，遣派医队，诚可谓克尽天职。总会、分会相互配合，取得了“八·二风灾”救护的圆满成功。

1923 年 2 月 19 日夜，四川梁山县城内校场附近大火为灾，800 余家遭殃。梁山分会筹款 2300 余串，赈济极贫及次贫 500 余户¹⁸³。四川灌县小南街失火，灌县分会“急赈火灾。”¹⁸⁴

同年春，皖北蒙城、太和“天痘流行，死亡无数，不但小儿传染，老人且亦染痘毒致死。”红会仍以蚌埠分会会长邓愚山为首率医队前往防治¹⁸⁵。这年秋，邓愚山还在宿州组织第三支医队，前往涡阳等县防治疫病¹⁸⁶。

12 月 21 日，红会总办事处得悉苏州阊门外横马路火灾，被灾者有百余家之多，“均属贫民，甚为凄惨。”庄录理事长特派职员沈金涛赴苏调查，拨棉衣 400 件救助¹⁸⁷。

1924 年 1 月，上海闸北邢家宅大火，数百户人家遭焚¹⁸⁸。朔风凛冽，灾户无家可归，

¹⁷⁶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出发两次救护队救疗潮汕巨灾》，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39 页。

¹⁷⁷ 《新闻报》1922 年 9 月 16 日。

¹⁷⁸ 《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 38 页。

¹⁷⁹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4 页。

¹⁸⁰ 《八二风灾本分会救护之情形》，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82 页。

¹⁸¹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82 页。

¹⁸²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会同澄海分会（即岭东分会）救潮汕灾》，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83—85 页。

¹⁸³ 《红会梁山分会救护之报告电》，《申报》1923 年 4 月 3 日。

¹⁸⁴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9 页。

¹⁸⁵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65 页。

¹⁸⁶ 《蚌埠分会三届出发医队报告》，《蚌埠分会第三支医队出发救灾》，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05、111 页。

¹⁸⁷ 《捐助苏州阊门外火灾贫民棉衣四百件》，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 年刊），第 139—140 页。

¹⁸⁸ 1924 年 3 月 14 日《申报》所载《川公路织绸厂失火惨剧四志》提及“邢家木桥焚屋六百余间”，当指此次火灾。

“啼饥号寒，极为惨苦。”¹⁸⁹1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派职员多人，会同该地警察6人，前往勘灾，按户计口，发给领米票证，灾户凭票即可“分往各店领米，计每人约得米五升，发出米票有五百数十张之多，灾户得此，莫不喜形于色。”¹⁹⁰

上海闸北简直遍地干柴，遇有星火即可燎原。邢家宅大火不久，再酿惨剧。3月10日午夜，闸北川公路祥经织绸厂“失慎”发生重大火灾，救火不及，百余女工葬身火海，数十人焦头烂额，300余人幸免于难，“如此浩劫，实所罕闻”。惨剧的发生，舆论多有指陈，一谓公共设施之不济，火灾发生时，因“无水灌救，遂致不可收拾，任其燎原。……闸北自来水，济人则不足，误事则有余，万姓号呼，不能邀主政者之一顾。若此次祥经厂之火，倘闸北水厂之水量充足，断不致灌救无方，焚毙百命。推论及之，凡此百人，非死于祥经之厂火，实殉于闸北之厂水耳。现在惨剧既演，水厂之应扩充，刻不容缓”¹⁹¹；一谓经营管理之不善，大火“焚毙工人多命，现时约略估计，据称已有百余人之多。别有一说，则谓该工人等，均携有子女，每人或携带一二三人不等，合并计算，当尚不止此数。似此求食远方，老弱稚幼，同归一烬，惨目伤心之事，孰过于此？据当时实地勘验者所言，俱称火起时东屋只有一梯，梯身又小，遂致阻塞出路，其寄宿之二楼窗外，又阻以铁栅，火势萦绕，无处逃生，葬身火窟之多，实由于此，一言蔽之，则该厂因设备之不良，以致惨毙多命，征诸舆论，殆属众口一辞。”¹⁹²

在祥经大火中，“死者吴江、震泽人十居其九。”生者由厂方发给每名15元，小孩5元，“着其回籍”。死者魂归故里，“生者虽有十五元在手，从此无衣无食。死别生离，不归何往，归不生全”，人间悲剧，莫此为甚。闸北公学校长冯明权为被难工人鸣冤叫屈，“该厂门狭上锁，遇险不开，事后复草草安排，在工人虽曰天命，工厂方面，人道何在？”¹⁹³

祥经织绸厂“被火焚毙女工案”如石投水，在上海滩激起层层波澜（如抬棺游行，酿成冲突），也引起社会各界的严重关切。事发后，作为人道载体的中国红十字会，于3月12日特派职员鲍康宁、夏凤池，“带同夫役，前往详细调查”，将寄寓宜乐里幸存者年龄、籍贯一一登录在册。13日，携带棉衣170套，现洋数百元前往施赈，并按照水陆路程，分别给以船票、车票，资遣回籍¹⁹⁴。据报道，14日，由红会资遣回籍者共88人¹⁹⁵。17日，闸北公学派人与红会接洽，“谓现在留沪女工，大半思归乡里，请为设法”。理事长庄录于是派职员往戴生昌轮船局，接洽遣送事宜，得到首肯，并允“将船费房资减半收取”。此次资遣女工32人（另有9人尚留医院诊治），连同被灾女工家属55人，共87人¹⁹⁶。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关怀，给遭火灾之殃的不幸者以慰藉，这是值得称道的。

1924年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3月21日，四川郫县东城居民“洪姓失慎，延烧街房壹百九十七家，十室九空，灾民等嗷嗷待哺，惨不可言”。次日，郫县分会会长应兆鳌率职员前往赈济，每户给米2升、钱数百文。“灾民等见红会之溥施济众，体上天好生之德，存仁爱之心也，灾民等感激之至。”¹⁹⁷还是四川，涪陵县“不戒于火，延烧数千家”。重庆分会闻讯，募集捐款数千元，于5月22日派职员周芳圃、刘承泽、王孝达乘“蜀亨”轮，前往赈济¹⁹⁸。与此同时，重庆分会会长魏国平以“灾区过大”，函请总会总办事处“代

¹⁸⁹ 《上海闸北邢家宅地方火灾放赈》，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150页。

¹⁹⁰ 《红会救济邢家宅烬余灾户》，《申报》1924年1月19日。

¹⁹¹ 《川公路织绸厂失火惨剧四志》，《申报》1924年3月14日。

¹⁹² 《申报》1924年3月18日。

¹⁹³ 《闸北公学之报告》，《申报》1924年3月13日。

¹⁹⁴ 《申报》1924年3月13日。

¹⁹⁵ 《红会之遣送》，《申报》1924年3月15日。前一天该报报道为84人。

¹⁹⁶ 《红会续送灾工》，《申报》1924年3月18日。

¹⁹⁷ 《郫县分会赈救火灾》，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175页。

¹⁹⁸ 《重庆分会赈救火灾电》，见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慈善近录》（1924年刊），第174页。

募赈款。”¹⁹⁹此外，本年广东顺德分会对大南沙风灾的救济、安徽蚌埠分会对皖北疫灾的救治、江苏涟水分会对当地天然痘、喉痧及鼠疫的救护等，都得到总会的赞扬。

1925年，上海火警时间。4月，闸北孔家桥、太阳庙火灾，总会散放赈款600余元。12月，闸北广肇路、太阳庙火灾，散放赈款600余元、棉衣200套²⁰⁰。

同年11月15日，四川灌县东门外大米市坝居民“不慎于火”，引发火灾，延烧165户。灌县分会闻警，派员前往调查。据报道，“受灾之家，纯系极贫小贩，当兹米珠薪桂，几于炊断釜悬，何堪岁暮天寒？又复家亡室毁，餐风露宿，惨不胜言，妇叹童号，情尤可悯”。灌县分会当即托钵四出，募捐筹款。次日临场散放急赈，“灾民等见十字旗来，咸夹道欢呼，其望赈之殷，不异云霓”。分会按照名册，每户给钱8串、米1升，共赈钱1320串、米1石6斗5升²⁰¹。

1926年4月1日，上海闸北广肇路、裕通路黑烟滚滚，烈火熊熊，又酿火灾，数千户遭殃，灾民达3700余人之多。火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派员散放急赈以济燃眉，“惟人数极多，事机极急，车薪杯水，救济为难”，乃发布劝捐通启，“敬乞诸大善士热心补助，义浆仁粟，多少不拘，俾眼前灾民得沾实惠，造福正无穷也。”²⁰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7年11月5日，上海发生“空前之大惨剧”。这天，沪北新和、公和等厂女工组织工会，假闸北开封路更新舞台前之品芳楼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500人，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亦派指导员沈言信等蒞会“指导一切”。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大会气氛热烈，“楼上正在呼喊之时，忽然瓦砾崩圯，三层楼全部坍塌，压及正兴馆之二层楼及楼下，一时惨声弥天，碧血横飞，当经隔壁北公益里祝姓报告闸北救火会到场救护，不及营救，横尸满地，鬼哭神号，其情形之惨酷，为空前所未有”。当场压毙126人之多，200余人受伤，工统会指导员沈言信亦遭斯厄，“此种不幸事件，实为上海空前之惨剧，见者莫不下泪，言之实堪痛心。”²⁰³悲剧发生时，适有中国红十字会队员靳纬曾经过，目睹此种惨状，立即打电话报告总办事处，总办事处立派总医务股沈金涛率领队员、夫役，分乘4辆救护车，疾驶品芳楼急救治疗，“到场后，但闻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幸该处三段救火会极力将房屋拆卸，运出受伤男女，分批用救护车及救火车运至天津路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及新闸路红十字会北市医院”。至下午5时，伤者陆续运毕，计天津路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收治60余人，除轻伤敷药自行回家调治和不及救治5人外，住院重伤者20余人；新闸路红会医院收治40余人，除轻伤敷药和不及救治者外，留院重伤者亦有20余人，其他医院也有数十人送往医治。红会医院“本系伤兵已满，当由庄（录）主任会同王总队长及吕监察，令将伤兵归并，俾让受伤女工安插治疗。”²⁰⁴竭力救治，尽职尽责之外，红会还参与了这一悲惨事件的善后工作²⁰⁵。

以上所述，当然不是中国红十字博爱事业的全部，每年夏天，红会时疫医院定期开幕，免费半免费为普通民众防治疫病，如1924年上海时疫医院医治时疫患者1348人，1925年2816人，1926年10634人²⁰⁶。他如每年春秋天的免费种痘以及总、分会开展的其他社会服务。总而言之，人道主义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中国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自觉行动，可歌可泣，尽管他们的行动存在着有待改进之处。

¹⁹⁹ 《救济四川涪陵巨灾之沪闻——重庆红会已携款前往救济》，《申报》1924年5月23日。

²⁰⁰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44页。

²⁰¹ 《灌县红分会赈济火灾之报告》，《申报》1926年2月5日。

²⁰² 《中国红十字会为闸北火灾急赈募捐启》，《赈济闸北火灾难民之昨闻》，《申报》1926年4月3日、6日。

²⁰³ 《上海空前之大惨剧》，《申报》1927年11月6日。

²⁰⁴ 《上海空前之大惨剧——红十字会之救护情形》，《申报》1927年11月6日。

²⁰⁵ 《发放闸北灾户恤款会记事》，《申报》1927年11月14日。

²⁰⁶ 《红会去年治疫之统计》，《申报》1927年1月16日。

About the Relief of Chinese Red Cross in the Period of Beijing Govern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 Zihu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Beijing govern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Red Cross broadened its humanitarian service while it continued to heal the wounded and rescue the dy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its relief at that time and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Red Cross was very active and helpful in many natural disasters and accidents and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relief history of China.

Keywords: In the Period of Beijing Government; Chinese Red Cross; Relief

收稿日期: 2005-01-30

作者简介: 池子华 (1961—), 男, 安徽涡阳人, 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